

我們不要這種「熱忱」

——評「文學休走」

江聲

記得以前看到這樣的一張照片，一個飽受戰火蹂躪的越南小孩孤零零的站在野地裏，嘴裏咬著煙。「文學休走」所選錄的文章對現代主義和臺灣文學的批評使人有這種聯想。二十多年來，我們的文學成就著實很難令人滿意，這是無可否認的一件事。雖然我們確實有少許的好作家，努力的完成了一些好作品，撇開質不談，量方面還是不夠的。儘管搖筆桿的人處境相當的艱困，以及社會、經濟、文化，等等客觀環境有形無形的限制，然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應該沒有任何藉口。我們樂意於見到反省，見到批評，更樂意於見到反省和批評有其效用。事實上文學並非可從社會區分開來的單一現象，它的好壞也是社會的一種表徵。也許在某些時候批評它時爲了避免太多的牽涉，有些人忘記了此點，而以文學可超然社會的局限來要求文學，如同有時不經意的於個人和羣體間在語意中劃下一道全然的分界。此地的文學，也許沒有其他的某些現象好，也許也沒有其他的某些現象壞。然文學是種社會良心的表達，它總是會被要求以一種理想的方式存在著。

近年來臺灣文學無法充分的提供一種理想方式，它無寧是像一般人一樣是個「受害者」，無法積極的展現現實，而受到相當激烈的指責。作家們也作了相當多的反擊，而支撐此種反擊的實證是相當薄弱的。問題的癥結所在，是我們無法提出足夠的優秀作品，貧弱的心靈根本無法負起任何的重量，當談到長篇小說和戲劇方面時，這點應更為明顯。因而批評者對此地的文學批評，態度非常嚴厲，而在某些時候，逸出了尺度，而以另一種偏向的外在要求於作者，企圖打開此一文學困境。「文學休走」所收集的文章主要的便表達了此種態度。因此，在此，我們的問題是這樣的，當產生成熟作品的內在和客觀環境都不充份時，是否一種熱心的文學功利論，在同一羣人身上有其成效？

「文學休走」一書是針對現代文學的缺失編印出來的。編者趙知悌在序文中很明白的標示了他贊同批評者的觀點，因此本書基本上並不在於提供雙方爭論的選錄，主要的乃在表現功利主義論者的看法，雖然裏頭有幾篇較為客觀的文章。以唐文標，尉天聰代表的功利論者，主張非關民間疾勞，民間問題的社會文學便非文學。此書還收錄了陳映真、關傑明、李國偉、顏元叔等人的文字，其中以唐文標慷慨激昂且堂而皇之的文章份量最重，佔了七十三頁，還不包括二篇附錄中因此而引起的顏元叔、余光中對其偏頗態度的批評，以及評余光中的文章。顏元叔對唐文標有許多嚴厲中肯的指責。余光中則詩人「率性」成份有些。顏元叔在另一篇「期待一種文學」中，提出其一貫的主張，如衆所知，顏元叔一向提倡民族文學、古典主義，主張文學批評社會，這一點和陳映真是意見相似的，和文學功利論者指責文學的逃避傾向是一致的。而顏元叔對唐文標之指責，可使我們明白後者所提方案偏差之處。

尉天聰將重點放在小說上，謂歐陽子和王文興未替小民說話外，較為普遍的現代詩成為攻擊的焦點。現代詩的病態，由於其形式內容之關係，而被不少人誤為是一種容易的表達方式而從事詩作，因此它包涵了更多的偽形偽式。如書中作者所共同指出的，它同小說一樣缺

乏對現實的觀照和關注，成了一個抄襲西方支流的四不像。離開了人間而躲入了象牙塔裏。唐文標、關傑明的文章針對新詩而發，亦共同指出其病態。儘管現代詩有許多缺失，可是吾人仍不能接受排他性甚重的社會文學觀。事實上本書收錄的文章程度上也有差異。尉天聰和唐文標排他性最重，而陳映真與顏元叔的文章無寧是較為客觀可取的。陳映真對現代主義客觀的分析，和對這瘠薄土地知性貧弱的指責是甚為痛切的，也是較冷靜的。在責備之餘他對此地的現代主義有這麼一段話，「若說我們的現代主義一無是處，也不是正確的，好幾年來，他們以他們的樣式，在語言的開拓上，在某種對於現代的反應上，做出了一定的成績。」顏元叔則說：「現代詩都沒有反應當代人生嗎？假使我們睜開眼睛看個真切，便會發現大量的現代詩正是時代的反映，甚至批評。」對於現代詩的缺陷，是不能以機械化公式來評論的。一種文學之形式、內容可因缺陷而受到指責，但吾人却不能同意以走羣衆路線文學為唯一的文學。現實有衆多的層次，我們無法要求作者去代表所有的層次，或某一層次為僅有的現實。我們只能在瘠薄的土地上，枯竭的心靈走向非理性，事物失去均衡時，喚醒一種智性的力量，再度喚醒作家對被忽略了的層次之關注。事實上，一個成熟的社會，一個成熟的個人即表示一種均衡的狀態，在裏邊各式東西以一定的比例構成一個整體，甚至在某些時候，少部份被認為無用的東西在整體上也有其不可見的調節功能。在某些時候此種均衡失去時，我們可以呼籲修正，排斥所有其他東西則是危險的。知識份子匡正世俗的理想是崇高的，且是相當必要的，即使經常在行動時它無法如預期的有為。這種理想和現實的差距總是存在着，任何的理想形式文學總免不了和社會理想一樣，與現實存在着差距。一個成熟的個人所見、所為、所想的，很難說他就完全的限於個人，人與人息息相關，人性有其共通處，任何嚴肅，負責任的文學，都有它的存在價值。在這方面顏元叔的態度無寧是可取多了，他說：「文學是一幢巨宅，裏面有千百間各式各樣的房間。」

現代主義類形的小說最近已較少見了。鄉土性的文學則增加了些，可是我們的文壇仍相當零落，以前還有些很出色的作品，現在竟也少了。是否如此的檢討有助於突破文學困境？是否這般的爭論和反省亦會像其他的反省一樣時過境遷？而目前對文學之殖民地色彩，和逃避主義的傾向的指責是否遺落了某種癥結，是否提出一種理想，甚或以爲使命性的社會文學觀便有助於產生優秀的作品呢？是否對文學現實環境的考量只是增加悲觀的看法？問題是：如果我們一種事做不好，另一種事也不太可能做得很好。這總是牽涉到內在力量、客觀環境的問題。我想對文學現實環境的考量如李國偉在「新生代的文學」所做的一部份，而對外在內在的條件有所改進，當會有助於解脫目前的困境。這不是短暫的問題，也不是單以一種文學觀來衡量所能解決的問題。如果我們有這種熱心亦會顧及到客觀條件之限制。因此，目前在這裏最需要的並不是一種文學宣言，或某種「熱誠」的口號，這些很容易和一般的陳腔混雜在一起，而經常沒什麼效用。在貧弱的土地上加了一道理想，些許宣言，就像多加了空話，增加了理想和現實的差距。目前我們最需要的倒是一種平實的作風，開放的心態和不懈的努力等等最平常的東西。即希望如本書作者之一游喚所說：「走著一種『坦白，平實，簡潔』路線的年輕新生代詩人正如雨後春筍般崛起，這是詩壇的新風氣。」在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缺乏文學典範，如同此地的人們在行爲上並不缺乏指標，事實上如果我們有些踏實的看法，而能執著的做到，那便不會是錯誤的。即使現實環境所能提供的養份瘠薄，但踏實的努力，可以累積一些成就，此種智性成份也可將被扭曲的形象稍稍的恢復原來的面目。日久了，文藝的復興方有可能。對作家的要求應是促進作家本身建立自己的努力，而使其作品基於自己的理念而自然的開花結果，以一種外塑的文學觀要求於文學創作是不切實際的，就好像改變一個人的努力，經常失敗一樣。